

数字化，让古籍触手可及

□ 吴丹

当古老典籍遇到现代技术，会产生什么奇妙反应？

一种“打开”古籍的全新模式

“初见”“流光”“惊鸿”“珠联”“缀玉”……点击网页上的标签，《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编纂方法、历史价值等信息，伴随着动画音效，呈现于眼前。

点击页面右上角“阅读大典”，进入文本阅读平台。《永乐大典》原本影像与数字化文本相互对照，繁简体文字随时切换。遇生僻词句，可选中文本，点击“查看引用”，出处清晰可考。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汇集先秦至明初各类典籍，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但几经散佚，副本存世不及原书的4%。对学者而言，《永乐大典》是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对普通读者来说，古籍文本往往艰涩难懂，且接触机会不多。

如今，《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辑）在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正式上线，免费面向公众开放。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厚重典籍浓缩在方寸之间，尘封已久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成为触手可及的文化资源。

“互动化、可视化的呈现方式更符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沉浸式阅读体验拉近了古籍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识典古籍”平台项目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位通说。

自2022年10月上线以来，“识典古籍”平台已陆续汇集经、史、子、集等2200余部古籍，面向海内外读者免费开放。该平台由北京大学与抖音合作共建，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免费、公开、稳定、快速、方便的检索和阅读古籍服务。

“识典古籍”平台项目负责人、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希望，“识典古籍”平台能推动散落海外的中华古籍回流，促成古籍的开放共享。

一次解决保护和利用矛盾的尝试

古籍数字化为何迫切？王军算过一笔账：我国现存古籍约有20万种，从1949年到2019年，共修复整理出版了近3.8万种，修复整理现存的全部古籍，可能需要300余年。可以说，古籍修复速度赶不上老化速度。

修复整理，只是数字化的第一步。古籍具有文物和文献的双重属性，修复好的古籍若只被束之高阁，后续研究就无法开展，更无法发挥其文化传承的价值。

因此，数字化是一场生产效率的变革，也是一次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矛盾的尝试。

一本古籍，如何从纸页“搬”到网页？

进入“识典古籍”平台，平台设计者、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浩开始演示：“古籍的数字化分为两

步。一是图像化，我们与海内外古籍收藏单位合作，广泛收集古籍数字化图像资料。二是文本化，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古籍文字进行识别、排序、校对、结构整理、标点、实体识别等，对内容作精细化处理。”

杨浩上传了一页古籍图像，不一会儿，文字自动识别处理完成。古籍图像上显现出不同颜色的小方框，“每个方框对应一个文字，先切分再调整顺序。红色方框是提醒此处需要人工介入，来进一步判断和处理。”

与此同时，古籍图像旁已自动识别出一段文字，并可比照原图进行修改调整。杨浩继续解释：“这个过程中，主要使用了文字识别、自动标点和命名实体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文字识别技术，是对古籍数字图像中的文字进行单个切分，再进行文字识别和顺序读出；自动标点技术，是通过序列标注的方式对古籍自动进行现代标点；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则是通过序列标注方法识别出文本中的人名、地名、书名、时间、官职等信息。”同时，在机器自动识别后，会有专人复查结果，进一步提升准确率。

据悉，“识典古籍”平台文字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6%以上，自动句读的准确率达到94%，命名实体识别在中古史料上的准确率接近98%。

“大部分古籍阅读平台或只提供扫描文档，或只提供文本内容，有些商业数据库收费高昂，获取资源十分不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生刘沐含说，“识典古籍”平台有着丰富的检索功能以及分类与年代筛选功能，可以辅助开展学术研究。

一个全流程的智能化整理平台

集纳展示古籍数字版本，不是“识典古籍”平台的全部。团队有着更大的设想——在一个平台实现古籍智能整理的全部环节。

“‘识典古籍’平台由两部分组成，前端是阅读平台，后端是古籍整理平台。”王军作了一个比喻，“就像是餐厅的前厅和后厨。”

目前，作为“后厨”的古籍整理平台，已经设定了团队管理员、书目管理员、审订员、整理员等各种用户角色。下一步，将吸引各行各业古籍爱好者、研究者，以众包校对、协同审核等形式，推进古籍整理项目和数据库建设，打造“古籍图像上传—文本校对整理—高质量标记—文本输出”的全流程系统。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刘钰昕，提前体验了一回“整理员”角色。

“希望能为损毁严重的古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2022年4月，看到北大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招聘信息，刘钰昕

第一时间报名，成为“识典古籍”平台的一名志愿者。

“我参与了《春秋左传注》《史记》《汉书》等古籍的校对工作。”谈及志愿工作，刘钰昕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印象最深的就是，为了制定魏晋南北朝官职标注规则，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还详细翻阅了《文献通考》的‘职官考’二十一考。”

“新时代古籍事业发展，需要一批对古典文献学、古籍保护、信息技术以及数字化流程都比较熟悉，又能将各方面有机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海峰建议，应加强古籍学科理论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编写适合新时代古籍工作需要的专业教材，以推进新时代古籍人才队伍建设。

“古籍是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有力证明，希望通过‘识典古籍’平台以及暑期工作坊、学术研讨等活动，推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向世界展示和传播我们的文化之美。”王军说。

新年伊始，杨浩写下了新的展望：“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2024年，希望能收集更多古籍、提升整理质量，更好守护古籍这个文明之根！”

(据人民网)



我国现存古籍约有20万种，修复整理现存的全部古籍，可能需要300余年。古籍数字化迫在眉睫。一本古籍，如何从纸页“搬”到网页？广泛收集图像资料、利用现代技术精细化处理……自2022年10月上线以来，“识典古籍”平台已陆续汇集经、史、子、集等2200余部古籍，免费面向公众开放，为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矛盾进行了有益尝试。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从古籍中获得灵感，由此发现青蒿素；在浩瀚古籍中寻幽入微，竺可桢绘制出一条物候变迁的曲线——“竺可桢曲线”，浓缩出五千年中华大地的冷暖变化图景。

卷帙浩繁的中华古籍，凝结着先人的智慧，记载着璀璨的文化，诉说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岁月不居，书阙有间，部分古籍正慢慢“老去”，褪色、脆化、腐蚀，甚至稍一翻阅就会损毁。



形绘汉江百年风云

□ 白猫

入死的共产党游击队员；有出身名门的千金小姐，有沦落风尘的青楼女子；有深悟禅意的高僧，有木讷憨厚的村民，各色人等，纷纷亮相。事件也异常密集。我在想，作者写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事，要传递什么内蕴？

首先需要解读的是作家的文化立场。作品里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有民间传统的是非观、善恶观，有代表中华道统的价值取向，但又包涵、夹杂了浓郁的佛理禅意。这一点，在作品的开篇就表现出来。从亡灵的视角引导读者进入作品，是一种文化隐喻，具有某种超越性。他看人间苍生，看人们走过的路，看滚滚红尘，万千喜怒哀乐，同时，也在张望人们既憧憬又怀不安地踏上前路。作品里的黄金峡，黄金峡的二十四险滩，既是汉江真实的自然的险要之处，又是一个物化的文化隐喻，是汉江人命运的象征，是难以逃离的人生境遇里的磨难考验。

了解了这一点，作品想表达什么似乎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简单说，就是写百年时光里，以褚天柱、褚瑞生、褚向阳等四代人怎么闯过人生的黄金峡和二十四险滩，写他们经历的各种磨难，写他们的命运遭际，写他们的喜怒哀乐。一代一代汉江人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出场，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勇敢、坚定、执着的精神意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的朴素心性，善与恶的交织转化，伙伴之间的侠肝义胆，险恶江湖中所折射的人情人性，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赓续传承……作品的旨归是人，是人的命运在时代的大波大浪里的沉浮起落。这些命运故事，读来令人或荡气回肠，或感慨唏嘘，都重重地叩击着我们的心灵。

我在想，作者的笔墨如果再凝练一些是不是更好？似可对某些事件进行高度浓缩。而有些塑造人物的“细节”，该浓墨重彩写的地方，却平淡掠过，令人遗憾。

《诗经·周南·汉广》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诗句，是说汉江滔滔又广，想要渡过去不可能。杨志鹏想用这部作品穿过滔滔江水，抵达他神往的彼岸，这是他文学理想的彼岸。我以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抵达了。说《汉江绝唱》是文学陕军和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收获，似不为过。

(据中青网)

新书架

《长白九章》



作者：斯雄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巍巍长白山，浩浩松江水。散文集《长白九章》收录作者斯雄书写吉林地域特征、人文风貌的9篇散文随笔，是作者对东北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凝望。从中，读者不仅能领略吉林或是银装素裹，或是层峦叠嶂，或是

清泉汨汨的美景，还能见证因地制宜保护绿水青山、创造美好生活的丰富实践。作者关注东北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注重将今昔之变联系起来，作品中既有历史脉络的记述，也不乏对今日东北创新活力的观察。《松花湖上话“摇篮”》用并进的线条叙事线索，与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相遇”，讲述丰满水电站的建设过程和“中国水电人才摇篮”的由来。新坝投运、老坝退役，印刻着时代的足迹，展示出我国水电事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制造”的日益强大。

《大医院里的小医生》



作者：陈罡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容简介：
医院生活的底色并不是单调的白色，在这个浓缩的社会空间里，每时每刻，信念、希望、爱三种元素都在交融着，激荡起五彩斑斓的生命诗篇。该小说展示作者对科学与健康、医生与患者关系的思考，用文学致敬

那些兢兢业业守护人们健康的医生同行。从学医到行医，20年的经历足以成歌。既放飞想象，也用理性去抓取那些值得记录的点滴。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修订本）》



作者：李剑鸣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内容简介：
修订版在介绍专业史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后，进一步分析了其后专业史学的转变。专业史家都有意无意地反思自己的专业特性，在理论和实践中不自觉地呼应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质疑，接受了其“去中心化”的主张，强调对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建构，运用“解构”策略处理史料、史事和成说，在研究表达中吸收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语言。专业史学鉴别吸收某些观点，借助其打破现代史学的理念和范式，重新思考史学的特性和旨趣，反思历史书写与“权力”的关联，重视差异性、多样性、纳入底层和边缘群体等题材，更审慎地运用和批判史料。作者在近十几年的阅读、研究、写作和教学中重新认识和理解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读者过去对后现代主义的成见。这是修订版最大的改动之处。

从舞蹈史的角度研究古代文明

——读《中国舞蹈考古》

□ 巫鸿



读书有感

数——不论是史前时代的岩画、地画和彩陶，还是在这之后的铜器、漆画、石刻、壁画和墓俑——都来自考古发掘。虽然作为视觉艺术作品，这些画像和雕塑对舞蹈的表现往往带有想象成分，或沿着当时视觉艺术的特定程式，但其呈现的图像本身——所描绘的舞者和舞姿——仍提供了理解古代舞蹈行为为极其可贵、无法由文字记载取代的第一手视觉证据。

考古材料对舞蹈史研究的第一层意义在于，舞蹈总是在特定的时空中产生，在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进行，并往往在具体实践中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如本书所阐述，自上古和三代时期开始，“舞”与“乐”已是不可分割的艺术形式，其密切的联系由考古资料不断反映出来。本书所讨论的文物因此不单纯是对舞蹈和舞者的形象再现，而且也包括了伴舞使用的乐器——从史前时代的骨笛和陶埙到商周时期的钟磬和编钟——以及表现乐、舞同演的图像，以显示这两种艺术的共生关系。进而言之，舞蹈、音乐的表演与视觉艺术的展示也不能分开。我们从考古发现的许多古代高级墓葬中看到的，从不是这三种艺术形式的截然分立，而是涵盖了三者的种种“总体艺术”场景，所显示的是在陈设华丽的室家环境中，舞蹈、音乐、绘画、雕塑的互动和结合，共同造就出结合了动态与静态、诸视觉和听觉的艺术盛宴。考古文物资料既包含对古代舞蹈演出的形象记录，也提供了重构演出空间和视觉环境的证据，以及探讨不同历史情境中“总体艺术”场合的素材。这应该也就是本书作者所展望的“将文物上的舞蹈二维形象置入三维以至多维文化空间的研究方式，使其与该历史时期的空间相互关联而成为有血有肉的鲜活有机体”。

《中国舞蹈考古》一书对考古资料的广泛使用，因此蕴含了“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学术概念和方向。舞蹈、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与人类文明同样古老，在漫长的时间中发展和完善了各自的媒介和语言：舞蹈以人体自身的动作传达信息和感情，音乐既用歌喉又通过人造乐器发声，绘画和雕塑则以不同的物质介质留下视觉形象。这些基本特征使之形成不同的艺术类别，也成为不同学科的探讨对象。但这些艺术形式在古人的实际生活中又从来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在共享的时间和空间里同时展开，相辅相成地发挥出社会、文化及宗教的功能，表达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思想感情。为了发掘和说明这种丰富的历史现实，我们需要使用所有能够找到的历史证据，特别是时代清晰、文化属性明确的考古材料。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获得了大规模的持续发展，为重新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面貌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巨型资料库，其规模在世界学术史上也属罕见。本书显示出这批材料对探索古代舞蹈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从舞蹈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明和艺术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入口。

(据光明网)